

算法社会中网络流行文化与大学生审美人格的范式转型

骆丽君

(贵州大学美术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在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社会肌理的算法时代,网络流行文化以其即时性、碎片化与强互动性特征,正重塑着人类认知世界与建构意义的逻辑框架。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大学生群体,其审美人格的形塑过程与网络文化生态的演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耦合性。在此背景下,探究算法社会中网络流行文化如何介入大学生审美人格的生成机制,揭示其从“解构”到“重构”的范式转型路径,这不仅关乎数字时代美育理论的重构,更对技术哲学视域下大学生的主体性重塑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网络流行文化;审美人格建构;范式转型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5.11.010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5)11-0028-03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一、绪论

随着5G通信技术与智能终端的深度耦合,网络文化形态正在经历范式性变革。短视频平台以“秒级叙事”重构内容生产逻辑,直播经济催生“数字劳动”新形态,弹幕文化创造“集体在场”的互动仪式,表情包则演变为数字时代的象形文字系统。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3)》显示,短视频用户日均使用时长突破2.5小时,Z世代群体中78.6%参与过弹幕互动,这种文化形态的液态化转向正在重塑当代青年的认知框架。

根据2024年度iiMedia Research的《2024年中国大学生消费行为调查报告》调查数据显示,86.1%大学生日均手机使用时长在三小时及以上。他们偏好使用购物类、娱乐类、新闻类及社交类App,分别占比25.7%、22.2%、19.3%及18.9%。35.0%的大学生表示最能够被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广告所吸引;其次是微信和小红书,占比分别为25.1%和19.2%。这种网络流行文化的“超文本性”特征使得大学生群体呈现“认知多线程化”(multithreaded cognition)倾向,传统审美教育的线性引导机制面临解构风险。

审美人格的构成是一个动态的变化,是主体对构建审美人格的解码能力与意义再生产,它包括审美认知—价值取向—行为表达三重维度。参照朱立元的审美关系理论,审美认知以感性特征,通过丰富的形象获得情感的共鸣,从而丰富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当下网络空间通过打造“界面沉浸”的体验和视觉设计,对人的对知觉综合能力进行重塑;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认为:人的文化资本包括知识、技能、教育程度、艺术修养、价值观念、信仰体系、行为规范、习俗传统等,大学生将网络文化消费中的符号选择行为视为价值立场的具象表征,他们在虚拟审美实践中形成的“数字惯习”(digital habitus)表现在举止、品味与语言之中,并形成其价值取向;在行为表达维度中,青年群体在网络表演性文化(如变装直播、AI换脸)中,在屏幕前出现的形象往往是理想化的和社会化的自我,在屏幕下才是真正的自我流露。“前台行为”与“后台认知”的张力关系,伴随着网络虚拟化发展,“前台”和“后台”之间的关系开始模糊,“身体”离开现场之后,审美人格作为算法社会中连接感性体验与理性判断的中介系统,其本质上是个体价值观的具身化实践。席勒在《审

美教育书简》中强调的“游戏冲动”理论在数字时代可以重新理解为:当青年群体通过虚拟化身进行审美实践时,其价值判断系统正在经历着当下算法社会的适应性进化。这种人格特质的形塑过程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效能,构成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变量。

二、网络流行文化的审美范式转型

(一)从静观到介入

托马斯·米歇尔在1992年首次提出“图像转向”,“图像转向”一方面是指当下图像取代语言表征成为人文学科的中心话题,另一方面是基于当下的公共文化领域中,大量图像的产生,形成“图像景观”。

视觉文化的“静观”与“介入”转向,标志着人类认知模式与审美经验的深刻变革。这场转向不仅是艺术形式的嬗变,更是主体与世界关系的根本性重构,分化,瓦解了传统艺术的“光晕”。电影蒙太奇造成的震惊体验,迫使观众从沉思转向应激性反应。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已将视觉经验转化为商品拜物教的展演场域。激浪派艺术家白南准的《电视佛》将闭路监控转化为自我指涉的视觉装置,消解了主客体的固定界限。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天气计划》通过人工太阳与迷雾装置,使观众身体成为作品构成的必要元素。社交媒体时代的影像用户,既是内容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其点赞、转发、二次创作行为构成数据流中的创造性劳动。虚拟现实技术更将视觉经验具身化,用户通过头部追踪与手势交互,在数字空间中建构动态的知觉世界。这种从静观到介入的转向,既解放了被压抑的感官潜能,也带来了新的认知困境。

(二)从碎片化影像到感官化审美

碎片化影像(如短视频、社交媒体动态、快节奏广告等)通过高强度感官刺激、即时反馈和算法推荐机制,逐渐形成了一种对现代人注意力、认知习惯乃至文化审美的“感官统治”。如短视频的快速剪辑、信息流的无限滚动、频繁切换的影像内容导致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TikTok短视频“15秒切换”,使用户形成跳跃性思维,大脑习惯于“即时满足”,对需要长时间专注和逻辑推理的任务(如阅读长文本、深度思考)产生排斥,形成“认知惰性”,也造成多模态感知的瓦解。在TikTok挑战视频中,“Bottle Cap Challenge”话题引爆全球时,

收稿日期:2025-3-7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2022年贵州省高等学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新时代背景下高校美育课程内容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ZJG20220748)。

作者简介:骆丽君(1974—),女,河南濮阳人,贵州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当代艺术、美术教育。

数亿用户沉浸在3秒的视觉奇观中,却选择性遗忘了触觉(瓶盖旋转的摩擦力)、听觉(金属碰撞的清脆声)、空间感(肢体运动的轨迹)构成的完整感知矩阵。这种感官的碎片化投喂,正在将完整的具身认知解构为离散的刺激单元。小红书上“多巴胺穿搭”,图片中高饱和色彩拼接的视觉刺激策略,推动“色彩情绪价值”成为新消费指标;B站“study with me”学习直播,通过构图、色彩美学,比如柔和的暖色灯光,窗外皑皑白雪,或者蓝灰色的海边风光,把学习与风景结合,将知识获取过程转化为可视化景观;碎片化影像的感官统治本质上是技术、资本与人性弱点的合谋。它在提供便利与娱乐的同时,也在重塑人类的认知模式和存在方式。

(三)从肉身到数字身体

舒斯特曼认为“具身化”美学是回到身体感知和经验的层面上,去体验、认识与实践感性个体的价值,并将其统一到具体的生命意识与生活实践中。在虚拟场域中,物质的肉体抽身离去,通过技术实现对可视化的身体空间与环境空间进行修改重构成数字景观,在景观中的身体被塑造,成为人们对理想形象生命形态的具身化呈现,腾讯“幻核”平台数字藏品Avatar定制服务,允许用户组合赛博朋克机械臂与汉服飘带,实现跨时空审美拼贴,《以闪亮之名》游戏提供2000+面部参数调节,玩家通过“纯欲系”“AI仿生人”等预设模板探索审美认知边界,物理身体的缺席使虚拟形象(如Avatar)成为可自由拼贴的符号集合,身体被简化为视觉元素的数据库,经验转化为参数调节。

通过在赛博空间上虚拟身份,使用技术方式使人类意识存在于网络之间,这种在虚拟空间中的数字身体,不仅凝聚着当下消费文化语境中的多重欲望,它同时也是现实世界中再具身化。将赛博朋克机械臂与汉服飘带组合,本质是跨时空符号构建,机械臂象征技术理性,汉服代表文化记忆,二者的拼贴消解了历史语境,将身体变为文化消费的展演界面,体现后现代审美的碎片化特质。《以闪亮之名》的参数狂欢游戏提供海量面部定制选项,表面上赋予用户“创造自由”,实则通过预设模板(如“纯欲系”)隐性规训审美认知,玩家在滑动条中追逐“完美比例”,事实是将福柯所说的“自我技术”内化为数字规训——虚拟具身化成为权力话语的新载体。安妮·巴萨姆(Anne Balsamo)指出:“即便在赛博空间,身体也无法完全消失,物质化身体的性别和种族身份决定了身体的文化再生产和接受科技化规训的方式。”

(四)从使用价值到符号价值

品牌通过符号系统的编码、传播与消费者解码的互动过程,将普通商品或服务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情感价值和文化权力的“精神货币”。这一过程不仅涉及视觉标识的塑造,更是一种通过符号操纵实现意义赋权、身份建构与社会认同的深层策略。比如喜茶×藤原浩“黑化”联名杯,将街头潮流符号注入茶饮消费,而LV×英雄联盟虚拟角色皮肤定价2000元/套,使游戏反抗精神沦为奢侈品牌的价值背书;品牌符号既是资本主义的文化引擎,也是人类意义建构的现代巫术。它既能以符号为媒介连接个体与共同体,也可能将人异化为符号游戏的提线木偶。

符号消费逻辑的兴起标志着消费行为从满足实际需求向建构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的深刻转变,这种转变不仅重塑了商品的价值体系,更折射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困境与人性异化。

比如网络语言中,“绝绝子”“yyds”等缩写梗,通过拼音首字母截断,实现语义的模糊化与传播加速,语义坍塌之后,形成梗文化背后的表达失语症;“退退退”从微信吵架视频衍生为淘宝退货神器,完成从现实冲突到商业符号的异化转身。

当工业化生产使商品功能趋同,使用价值逐渐沦为符号价值的物质载体。智能手机脱离通话需求,转而体现在品牌

logo承载的阶层密码,这种消费异化现象本质上是现代性矛盾的投射。人类将自我认同外包给商品符号,导致主体性的消解,更预示着文明发展的深层危机。

三、网络流行文化与大学生审美人格的双向建构

(一)多元审美意识的觉醒

多元审美意识的觉醒是当代社会文化演进中的一个显著现象,它标志着人们对“美”的认知从单一标准向包容差异的深刻转变。这一过程不仅是艺术或时尚领域的变革,更是社会价值观、权力结构以及全球化互动的折射。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消融了地理边界,人们得以直观接触非洲部落的装饰艺术、东亚的传统美学、拉美的街头文化等。这种跨文化碰撞迫使社会审美单一标准被质疑。少数族裔、身体障碍者、LGBTQ+群体等通过艺术、自媒体和公共运动(如“身体积极运动”)争夺话语权。例如,大码模特阿什利·格雷厄姆登上《体育画报》封面,白癜风模特温妮·哈洛成为时尚界新宠,这些案例直接挑战了传统审美中的“完美身体”神话。Instagram、TikTok等平台让普通人成为审美创造者。滤镜文化在看似强化审美标准化下,实际则催生了“亚文化审美圈层”——哥特、赛博朋克、Y2K等风格通过算法找到受众,形成去中心化的美学生态。

多元审美意识将“美”从标准统一的规训工具转化为解放工具。当一个人可以坦然展示伤疤、白发或非标准的身体,当人们能够认识到各种“美”的存在,而不是用自己的单一标准评判差异,这种多样性本身便构成了社会的新融合。“美”不再是被定义的标准化的终点,而是个体与群体在动态中不断重构的旅程。

(二)参与式文化中的形成

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是数字时代的一种重要文化形态,其核心在于普通用户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主动参与内容创作、传播和再创造的“产消者”(Prosumer)。在这种文化生态中,创意表达呈现出开放性、协作性和去中心化的特征,深刻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的文化生产逻辑。在算法社会与数字媒介深度耦合的语境下,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已超越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早期定义的“粉丝文本再生产”范畴,演变为技术中介下集体智慧与个体创造力交织的新型文化生产范式。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青绿腰”动作经抖音用户二次创作后,引发超800万次模仿挑战,参与者通过身体复刻、场景混搭(如厨房版、工地版青绿腰)完成对宋代美学的平民化阐释。该现象印证了米歇尔·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的“盗猎”理论——大众并非被动接受文化权威,而是通过“拼装战术”将精英艺术纳入日常生活实践,构建起算法时代新的文本意义。蔡徐坤在综艺节目中的篮球表演被B站用户解构为“鸡你太美”鬼畜视频,衍生出《律师函警告》《坤学辞典》等系列二次创作。用户通过弹幕造梗(如“全民制作人们,请多关照”)、AI换脸嫁接等行为,将饭圈文化中的单向崇拜转化为平等对话的“数字狂欢节”,就如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言——亚文化群体通过“符号暴力”争夺文化资本。青年用戏谑性解构打破流量明星的符号垄断,在巴赫金式的“狂欢广场”中重建话语权。

当算法成为新型文化治理权力方式,参与式创意表达既是大众的技术赋权工具,也是重构意义世界的可能性空间。当下大众深度参与媒介的案例揭示的不仅是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更是数字公民在技术迷宫中寻找主体性的生存智慧——通过二度创作实现文化启蒙,借助符号解构争夺话语权,依托模因传播完成情感救赎。

(三)虚拟社群的审美共同体构建

传统美学理论认为审美共同体的根基在于物理空间的

共在体验与历史时间的意义沉淀,“灵晕(Aura)”始终依附于物质性的“此时此地”。然而,在当下算法社会中,审美经验的生成场域已发生跃迁。在网易云音乐的评论区,用户通过诗歌进行互动,形成疗愈空间。体现了集体创作和情感共鸣,编织出赛博空间的“哭墙”;大学生在《原神》中通过角色创作探索审美身份,涉及数字孪生身份的实验,用户通过自定义角色表达理想自我,属于身份建构和虚拟空间的审美实践,虚拟世界中的身份表达共同搭建了审美共同体,同时也反映和影响了现实中的审美观念。在豆瓣的算法战场,豆瓣小组的成员通过评分和讨论,形成对小众影片的共同评价标准,这涉及权力结构和文化资本的分配——这些数字群体正在重新定义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灵晕”。虚拟社群的审美实践呈现出令人惊异的悖论性:它既被平台的算法逻辑严密规训,又不断从技术系统的裂缝中迸发出野性的创造力;既折射出现实世界的权力结构,又孕育着超越物理限制的乌托邦想象。在这里,审美判断不再是康德式的纯粹理性批判,而是演变为一场算力、情感与符号的角力游戏。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认为:“照片既是对现实的占有,也是对现实的重构。拍摄行为本质上是对经验的主动解释而非被动记录。”数字时代审美共同体的新型构建逻辑,通过情感疗愈抵抗数据异化,借算法共谋重构文化权力,在虚拟身份中实验存在可能性。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技术人文主义愿景——当算法规训试图将审美体验降维为数据点的分析,这些自发形成的数字群体正在用诗歌、评分与虚拟化身,在算法中重建人性的审美共同体。

(四)审美异化风险维度

在算法世界里,人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审美认知革命。在数字化和算法主导的环境中,个体的审美判断和体验被技术工具和平台规则所扭曲或控制,失去自主性和多样性,包括算法推荐导致的审美趋同、滤镜技术对自然美的标准化以及虚拟身份对真实自我的遮蔽等,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困境——审美异化,这个曾被法兰克福学派预言的文化病症,正在算法社会的温床上变异出新的形态。首先是算法茧房导致的审美窄化,例如抖音“沉浸式XX”系列视频的同质化生产,反映算法推荐对创作取向的操控以及对数据画像的隐性规训;美图秀秀“AI绘画”功能引发模板化视觉表达,审美判断的机械复制以及认知框架的路径依赖;第二是景观社会中的审美疲劳,如快手“黄金三秒”法则导致叙事碎片化,感官过载的麻痹效应,网红打卡地滤镜欺骗现象,揭示景观建构对现实审美的殖民化危机——拟像吞噬本真;第三是消

费主义对审美自主性的侵蚀,如星巴克“猫爪杯”抢购事件展现符号消费对使用价值的碾压以及审美资本的商品化,小红书“ins风宿舍改造”产业链,则将个性化表达转化为标准化商品包。

审美异化已不再是隐喻层面的文化批判,而是成为可量化的神经事实。这种异化机制的恐怖之处,恰在于其将福柯式的“规训权力”升级为德勒兹预言的“控制社会”——通过多巴胺奖励的精准调控,使个体自愿屈服于算法构建的审美秩序。

结论

在算法社会的湍流中,大学生的审美人格正经历一场静默的美学变革:TikTok的滤镜将千万张面孔熔铸成同一张“完美面容”,AI换脸消融了伦勃朗式的光影深度,我们目睹的不仅是文化形式的迭代,更是人类审美认知范式的基因重组。算法社会开始解构色彩感知的物理基础,人工智能威胁着艺术创作的人性内核,这场审美人格的范式转型已超越文化范畴,成为人类在技术奇点前守护主体性审美的最后的可能性。网络流行文化既是异化的推手,也是抵抗的武器——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在算法的铁幕上,凿出足够让灵韵透光的裂缝,这裂缝中闪烁的,或许正是数字时代审美救赎的熹微曙光。

参考文献:

- [1]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3)[EB/OL].<https://www.xdyanbao.com/doc/40t6wrej1n>.
- [2]艾媒咨询(iiMedia Research).2024年中国大学生消费行为调查研究报告[EB/OL].(2024-8-14).<https://caifuhao.eastmoney.com/news/20240814104420135913450>.
- [3]郑二利.20世纪图像研究:从图像学到图像理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263.
- [4]王亚芹.“具身化”:理查德·舒斯特曼美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97-98.
- [5]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只此青绿》新媒体传播数据报告[EB/OL].<http://www.dfyanyi.com>.
- [6](法)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M].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239-246.
- [7](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50.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e Paradigmatic Shift of Online Popular Culture and College Students' Aesthetic Personality in Algorithmic Society

LUO Li-jun

(School of Fine Art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In the algorithmic era where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deeply embedded into the social fabric, online popular culture, characterized by immediacy, fragmentation, and hyper-interactivity, is reshaping the logical frameworks through which humans perceive the world and construct meaning. As “digital natives”, college students exhibit unprecedented coupling between the formation of their aesthetic personalitie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networked cultural ecosystem.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online popular culture in algorithmic societies intervenes in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s of college students' aesthetic personalities, revealing its paradigmatic shift from deconstruction to reconstruction. This exploration holds significant value not only for reconfiguring aesthetic education theory in the digital age but also for redefining students' subjectivity withi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n technology.

Key words: online popular culture; aesthetic personality construction; paradigmatic shift

(责任编辑:杨雨青)